

论美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模式的战略构建

耿有权

(东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96)

[摘要]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模式,是指一个国家从国情和制度出发而探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建设一流大学的实践范式。美国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关键在于找到了属于美国的一流大学建设模式:建设自由、开放、昂贵、竞争的环境;以多样化的投资支持大学的特色发展;将全球名校纳入美国大学的循环体系;以学术中心及顶尖项目集聚全球精英;以危机和忧患凝聚共识,保障教育投资;以常春藤理念引领一流大学的精神境界。21世纪,要早日实现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则须立足国情和制度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模式。

[关键词] 世界一流大学;美国模式;美国战略

[中图分类号] G648/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469(2010)10-0027-06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模式,是指一个国家从国情和制度出发而探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建设一流大学的实践范式。当今世界,美国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最多,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强国,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没有任何国家能挑战美国的教育强国地位。长期以来,各国有意或被迫将其最优教育资源对接美国教育体系的需要,客观上促成了美国与世界教育资源循环。而以“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为代表的美国一流大学群体及其建设模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1世纪,在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我们切不可仅关注少数一流大学的个案建设问题,而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进行模式创新,特别要注意跟踪研究美国一流大学模式建设的经验和动态发展。这对我们掌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规律,以及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构建自由、开放、昂贵、竞争的环境

20世纪以来,美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流大学建设模式。这个模式的建设,除得益于雄厚的经

济实力、英语国际地位、众多学术中心等优越条件外,重要的是,美国综合各种有利因素,构建了属于美国的自由、开放、昂贵、竞争的生态环境。如果说学术自由是尊重人才创造性的根本,开放是吸纳全球科学家群体的巧妙设计,那么,昂贵就是维持美国强国地位的重要基础,而竞争则是确保高质量教育与资源对接的关键。实际上,这种生态环境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密切相联,可以说这是美国人经过200多年艰苦努力才获得的。关于自由的理念,不妨透过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予以考察。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强调,是上帝的赐福“使美国人民自由、幸福,并神圣不可侵犯,美国人民就是为这些崇高的目标而组织自己的政府的”。^[1]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独立宣言》中声称:“所有的人生而平等,这是造物主赋予人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建立了政府。”^[2]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主张“建立一个基于人类不可缺少的四大自由之上的世界”。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远离恐惧的自由。”^[3]第36

[收稿日期] 2010-07-06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重点课题《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构建研究》(课题批准号: B—b/2009/01/002)。

[作者简介] 耿有权(1967—),男,安徽全椒人,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

任总统林顿·贝恩斯·约翰逊 (Lyndon B. Johnson) 自信地指出:“在以公正、自由、团结为宗旨的公约指导下,我们的国家变得繁荣、伟大和强盛,而且,我们还保持着自由。”^[4] 现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则以“自由的新生”为题的演讲宣布就任美国第 44 任总统。当然,这里不能片面地理解美国宣称的“自由”理念,但是,它至少表明美国社会对核心价值观塑造的引导取向。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开放是其吸引全球精英人才的一个高招。建国后,美国实施了开放性教育战略,除了向德国等欧洲国家派遣大批留学生,借鉴德国模式建设了一批大学,还开放其重要学术机构,吸引全球精英人才,包括爱因斯坦、杨振宁等科学家都定居美国,并把毕生智慧献给了美国科学事业。特别是 20 世纪前期,美国拒“战火”于国门之外,凭借其经济优势吸引全球英才加盟,形成了今日美国的强国地位。麻省理工学院(MIT)前校长查尔斯·维斯特(Charles M. Vest)总结指出,美国高校出类拔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国际学者的开放。他说:“事实上,美国大学中 1/3 的理工科博士学位授予了外国公民,仅在工程领域,就有一半的博士学位为外国公民所获得。这些博士学位获得者当中许多最初都在美国求职,其中大约 40% 永远留在美国。这对美国的工业、大学和政府实验室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资源!这促成了美国大学的伟大,在国家建设中,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这种精神和宗旨。”^[5] 昂贵是美国大学傲视全球大学的重要支撑。二战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占据全世界的近一半比重。而美国大学也富可敌国,如 2004 年,哈佛捐赠资金达到 225 亿美元,名列美国高校第一,大致相当于一个欧洲小国的 GDP;耶鲁则以 127 亿美元名列第二,^[6] 其他大学的经费也令人羡慕。更重要的是,高度发达的自由竞争市场模式为美国大学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受市场经济的影响,美国高校在招生、经费、教师、质量、环境等方面丝毫不敢怠慢,因为没有哪一所大学能够保证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会被淘汰。竞争为美国大学带来了国际竞争力。

二、以多样化的投资支持大学的特色发展

正如美国高等教育专家菲立普·阿尔特巴赫 (Philip Altbach) 教授指出的那样,“注重研究、探索和质量,是研究型大学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在

某些领域,只有最富裕的研究型大学才能支持前沿研究”。^[7] 因此,任何国家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则须确保给潜力型研究型大学巨大而稳定的经济支持。但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则很有讲究。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如果说英、法、德等国是以一元化的政府投资为主导,那么美国则是以多元多样化的民间投资为主导。换言之,多元多样化且高质量的民间投资支持了美国大学的特色性发展,这是美国一流大学模式构建中的一个成熟经验。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F. 理查德 (Alison F. Richard) 曾指出,美国大学建立比中国晚得多,比英国也晚几百年,却得到了联邦政府、州政府的坚定支持和校友的馈赠(指民间投资),这一点是美国高等教育多样性的最关键的特征——这个特征使美国高等教育后来居上。^[8] 在美国,教育投资的多元化、多样化,包括国家投资、私人投资、企业投资、慈善投资等,以及实施市场参与资源分配的运行体制,使得美国大学可以自由地安排乃至构建富有特色的大学治理制度。特别是在求真至善、学术自由、服务社会等方面,美国大学获得了优于其他国家大学的环境和条件。美国学者詹姆斯·杜德斯达 (James J. Duderstadt) 赞赏其奥妙设计的价值,他自豪地指出:“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拥有一系列的公立和私立、大大小小、多种多样的学院和大学。大多数国家利用有力的集中计划和协调来决定大学的任务、质量和财政支持,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由师资、学生和资源方面的市场竞争压力来决定。”^[9] 确实,美国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总是处于自由竞争发展的环境中,这个环境不仅包括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的竞争,而且包括经济规模的竞争和制度设计的竞争,所有这一切皆有助于培育美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生态环境。

诚然,多元、多样化、高质量的投资客观上也保证了美国大学自由、开放、昂贵、竞争的环境稳定性。细析之,第一,此制度设计可使大学对美国政府的依赖不如发展中国家那样强,却能保证自身的自由发展;第二,市场化运作经费激发了大学的竞争,有益于保证大学的高质量和高水准。历史表明,美国一流大学不随政府或政权的更迭变化而变化,这让各大学获得了符合自身要求的特色性发展空间。事实上,美国不仅投资办大学是这样,而且学生资助也是如此。例如,1876 年美国银行家约翰·霍普金斯 (Johns Hopkins) 私人资助创办了霍普金斯大学,这是美国仿照德国模式的第一

所研究型大学,其创立标志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诞生。1890年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私人资助创办了芝加哥大学,不仅在研制核反应堆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而且为经济学理论做出了杰出贡献。1891年美国铁路大王斯坦福(Stanford)出资创立了斯坦福大学,其多个学科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为人称道的“硅谷奇迹”即诞生于此。同时,美国各界投资培养学生也是如此一致。有学者研究指出,“现在,美国联邦财政每年为大学生提供约500亿美元的资助。超过55%的本科生从联邦、州、私人资金接受一定程度的资助,平均每个学生6256美元。对研究生的财政资助所占比例更高,超过60%的研究生接受某种形式的财政资助,平均每个人为13255美元。”^[10]当然,美国大学投资一般不是根据学生出生或身份分配的,而是根据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习表现来决定,这使得美国大学生具有强烈的全球竞争力。近年来,英国等国高校效仿美国式学生奖学金分配政策,就是典型案例。

三、将全球名校纳入美国大学的循环体系

我们知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代价昂贵,显然,一些发展中国家是难以承担其建设成本的,但是,任何国家的建设都需要一流的人才。因此,不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都希望美国名校为其培养精英人才。自然,发展中国家的众多高中名校甚至重点大学群体,都在为美国一流大学输送人才,而美国最终往往以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把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挽留下来”,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少数归国者,也是美国价值观的认同者和传播者,对美国有百利而无一害。客观地说,21世纪,世界已经形成了以美国大学为学术中心的精英人才循环教育体系。据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统计数据,2008年全球大学排名前200名中美国大学有70所,占总数的35%,排名前300名中的美国大学有90所,占30%,排名前500名的美国大学有143所,占24%。^[11]那么,美国大学的策略是什么?哈佛校长曾告诉杨福家教授:“我的职责之一是从世界各地找到有才能的人。如果我要在某一领域招募一名教授,我会找到这一领域里最好的一位教授并努力邀请他。如果不行,就去找仅次于他的。通常情况下,如果请不到最好的,我能请到排名第二的。”^[12]其实,美国一流大学对优秀学生也是这

样。如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口号是“只要你优秀,学费不用顾虑”。斯坦福大学承诺“不会因为学生经济问题将已考取的学生拒之门外,斯坦福大学有90%的学生可以得到不同形式的资助,以支付高额的学费。”^[13]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确保培养精英人才已成事关国家未来的最优先课题。为此,西方国家已为吸引优秀人才制定了完善的战略。如2007年,美国政府专门建立了面向理工科博士课程的新的奖学金制度,并从全球严格选拔和破格录取第一批30名留学生。他们被视为“天才中的天才”,每人每年享受奖学金16万美元,为期5年。同时,哈佛、麻省理工等名校正在与亚洲大学展开合作,在这些国家进行与美国本校同等水平的授课,学生可获得同样资格。而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很快被输送到美国。^[14]就是说,美国高校正在海外名校从事一项挖掘“神童”并将其吸引到美国的战略任务。

不难看出,美国战略上是把全球名校纳入自己的知识和人才循环体系,它欢迎并以一流生态环境吸引全球英才加盟。美国使其大学建设完美地融合到了全球教育体系中,特别是把全球名校融合到自身的大生态体系中,这客观上造成了美国一流大学高居全球大学体系的“顶层结构”,而其他国家的名校都是位居其下的“基础结构”或“基础部分”。由于“尖顶只有一个”,于是,美国只需建设好“顶层结构”,就可以使其大学体系傲视全球、赢得世界。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不仅是美国大学成功的关键,而且是维护美国强国地位的关键。且以数据为证。斯坦福大学2010年共计有本科生6878人,这些学生来自全球各国。从入学录取水准看,入学新生高中班级前10名的占92%,前20名的占98%,SAT评判性阅读700-800分的,占58%,SAT写作700-800分的,占61%,SAT数学700-800分的,占67%。这些学生的民族构成为:非裔美国学生占10.6%;亚裔美国学生占22.5%;国际留学生占7.6%;墨西哥裔美国学生占7.7%;美国原住民学生占3.2%;夏威夷原住民学生占0.9%;其他拉美裔学生占6.9%;白种人占33.1%;其他种类人占3.5%;不透露国籍学生占3.9%。^[15]加州大学2006年就制定了一个交流项目,与35个国家、150所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每年有4500名学生到其他国家学习,1000名交换生到美国学习。在派出的4500名学生中,男女比例是3:7。实际上,美国其他世界一流大学情况也

都相差不多。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全球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

四、以学术中心及顶尖项目集聚全球精英

美国第2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说,任何社会最终都将由精英统治。这的确是一个真理。那么,精英人才如何培养?在我看来,主要依靠供职于世界学术中心的顶尖学者及其所在国家支持的学术项目来培养和教育。长期以来,坚持以顶尖科学研究项目吸引、凝聚全球精英,一直是美国一流大学建设最显目的一大战略。菲立普·阿尔特巴赫教授指出:“研究型大学从全国乃至全世界录取最优秀的学生。研究型大学还雇佣最有才华的教授,这些科学家和学者被学校的研究导向、设施及更有利的条件所吸引。”^[16]在美国,每所著名大学都有各种各样的科研项目,它们或是各级政府投资,或是慈善基金会支持的,或是各种财团支持的,或是个人投资的,而且都给予相对宽松、自由、开放的鼓励政策,允许人们自由地研究问题或课题。对此,美国学者骄傲地指出:“美国大学的学术项目质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赢得了绝大多数的国际大奖,如诺贝尔奖等,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17]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美国基础科研经费的60%用于大学基础研究,100所研究型大学获得联邦科研经费占联邦科研总经费的84%,20所主要研究型大学所获得联邦科研经费占联邦高校科研总经费的55%。2000~2004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向高校“科学”与“工程”两个领域投入的研发资金为1044亿美元,年均209亿美元,其中纯研究资金占到经费总额的86%。^[18]这表明,美国大学充分发挥了全球学术中心和全球学术项目的引导功能作用。

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一流大学诞生的辉煌时期。美国政府通过重点投资引导大学的发展和境界的提升。典型案例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参与了20世纪最伟大的三大科学工程——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这是美国一流大学凭借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的模范。其一,始于1941年的“曼哈顿工程”历时5年多,耗资22亿美元,72所大学及其他机构、1400多名顶尖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参与了这个工程,参与大学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

康星大学等著名大学。其二,“阿波罗登月计划”始于1961年,历时11年,直接耗资250亿美元,有120多所大学参加。在计划实施过程中,一流大学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两轮试验的飞船项目是由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研制的,同时,MIT深度参与并成功设计了阿波罗飞船的制导和导航系统,为顺利登月提供了技术保障。其三,“人类基因组计划”始于1990年,历时15年,耗资30亿美元,此工程中,一流大学再次担当主角。参与大学有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MIT等研究型大学。这项工作被誉为“改变世界的科学计划”和“人类科学史上的又一次革命”。^[19]可以说,正是由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积极参与和巨大推动,美国才在科学研究上遥遥领先于各国,同时使得美国世界一流强国的地位不可撼动。

五、以危机和忧患凝聚共识,保障教育投资

美国重视教育,且经常用两种正反配对的策略来实现对教育投资的战略。这表面上好像让人费解,但实际上包含了深刻的战略意蕴和人文底蕴。我们知道,美国除1945年出台的著名报告《科学——没有无止境的前沿》、1958年出台的《国防教育法》和1960年发表的《西博格报告》,正面引导、支持投资大学的发展并促其奔向世界一流目标之外,还有一个基本策略,就是经常使用“危机警醒策略”,以便唤醒民众支持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如1983年美国国家优质教育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发布的《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呼吁民众支持大学教育。2004年,时任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主席的雪莉·安·杰克逊(Shirley Ann Jackson)指出:“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技术革新的领头羊。美国开设有最好的研究生课程,有最好的科学基础设施以及把知识转化为利润的资本市场。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美国科技界,一场平静的危机正在酝酿。我们要把自己放在全球环境中,要看到所有与美国竞争的国家不仅头脑清醒,同时还在与我们进行着‘马拉松比赛’,可我们只是短跑成绩优秀。”^[20]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nited States)等机构发布题为《在风口浪尖上》的研究报告。该报告

认为,为了21世纪美国的发展,在未来7年,美国在研究领域的投资每年须增长10%。它还推荐了几个新的研究补贴项目,以资助大约200个最杰出的年轻研究人员。^[21]中肯地说,这种正反配对策略有两个宣传效果,一是容易激发普通人的深层次思考,如人们会问“我们国家为什么处于危机状态中?”而对此问题的追问,则能唤醒人们的重视。于是导致其二,国家很容易赢得民众对教育投资战略的支持,况且,对国家教育投资的支持长远看也是对家庭的支持。回顾历史,美国各界政府屡试不爽。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这是美国民主社会中特有的教育文化。

当然,仅依靠政府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各所一流大学带头发挥危机引导作用才是最关键的。如,时任哈佛校长的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在350周年校庆中的一席话让人启示良多,他说:“如果说350年来哈佛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特点的话,那就是我们总在心神不定地担忧,即使在从外界形势看来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时也是如此。当我们为我们取得的成就而高兴时,会突然本能地感到一阵异样的疼痛,虽然我们强忍着,但也不免说出来。我们知道有多少学院在它们的全盛时期种下日后衰退的种子。我们的第二天性使我们从自我陶醉中清醒过来,时时间问自己有什么敌对的力量存在,命运会有什么改变,有什么内部矛盾和过分行行为会削弱我们的大学或阻止它为满足现代社会和人类的需要而做出贡献。”^[22]可以说,哈佛虽成就卓越,但它还总在找寻发展的历史动力。近年来,美国学者围绕“大学危机”又在进行深入的反思。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的《回归大学之道——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Harry R. Lewis)著《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耶鲁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克罗曼(Anthony Kronman)的新书《教育的终结:为什么大学教育放弃了人生意义》等。此外,也许是“旁观者清”,著名管理思想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代表许多领导人警示性地指出:“我认为在过去四十年中美国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失败。未来对于教育的需求不在研究方面,而在学习方面。”^[23]“我们应该要求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发能够充分利用其丰富智力资源的本科生教育新模式。”^[24]实际上,鉴于哈佛等一流大学过分地引领世界大学的“研究”潮流,导致美国高教界甚至发

出了“去哈佛化”的号召,以便为重视和提升大众化本科教育质量开辟新途,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注意。

六、以常春藤理念引领一流大学的精神境界

美国常春藤盟校历史悠久、学术优秀,广为人所知,已经成为美国顶尖名校的代名词。这些大学不仅是美国150多所研究型大学的“领头羊”,而且是全球一流大学群体的杰出代表。这些大学无不以弘扬“常春藤理念”闻名于世,并时刻“感染”着各国大学。在我看来,所谓“常春藤理念”,简言之,就是恪守大学优良传统,秉承学术独立原则,坚持自尊自律,不畏权贵,不以钱财论英雄,始终以担当人类使命为己任,始终以培育精英人才和发展科研事业为核心任务。虽然,我们不能说美国一流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一贯如此,但可以说在其大部分时间内都坚持了应有的大学精神。不妨引用几个案例说明。案例之一,2000年,又到哈佛大学遴选校长时,新离任的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副总统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被提名。但哈佛很快就将这两个伟人排除在外,原因是:他们俩可以领导一个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好一所大学,因为领导一流大学要有丰富的学术背景,而他们都不具备。后来,原任财政部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被选为新校长,理由是他在经济学领域做到了世界一流,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虽然后来,萨默斯校长因为在学校管理和领导作风等方面存在不受师生欢迎的问题,最后又被投下不信任票,惨然离开哈佛大学,但是,正是萨默斯校长的上任和离任“进行曲”,逼真地再现和反映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追求和境界风范,说实话,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中国的重点大学思考和学习。

案例之二,越南战争时期,美国政府下令,凡是自称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战者一律不准领取奖学金。当时美国各个学校都遵守了这条禁令,惟独耶鲁大学始终不移地坚持自己的学术独立原则,仍然以申请者成绩为获得奖学金评比依据而无视战争条款,虽然它因此饱受政府的批评,并损失了一大笔的经费,但当时的校长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却在耶鲁学子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和尊敬。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世界一流大学对人类最高精神境界追求的弥足珍视和坚定守护。

[参考文献]

[1][美]乔治·华盛顿. 总统就职演说[A]. 岳西宽, 张卫星. 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C].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3.

[2][美]托马斯·杰斐逊. 独立宣言[A]. 徐翰林.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演说[C].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9. 27.

[3][美]富兰克林·罗斯福. 富兰克林·罗斯福论四大自由[A]. 徐翰林.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演说[C].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9. 178-179.

[4][美]林顿·约翰逊. 总统就职演说[A]. 岳西宽, 张卫星. 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C].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268.

[5][美]查尔斯·维斯特. 一流大学, 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 [M]. 蓝劲松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12.

[6]薛涌. 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察[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34.

[7][16]Philip G. Altbach. Peripheries and centers: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2009, (10): 19-20.

[8][英]艾莉森·F·理查德. 著名大学是如何产生和可持续发展的[A]. 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第二辑)[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55.

[9][10][17][美]詹姆斯·杜德斯达, 弗瑞斯·沃马克.

美国公立大学的未来[M]. 刘济良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3, 33, 2.

[11]The Times ranking [EB/OL]. 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_rankings/results/2008/overall_rankings/. 2008/2010-07-25.

[12]杨福家. 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杨福家卷[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05.

[13][美]马丁·卡诺依. 知识经济中的大学: 潜力与隐患[A]. 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第二辑)[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56.

[14]全球留学生争夺大战愈演愈烈[EB/OL]. <http://www.wei.moe.edu.cn/article.asp?articleid=411>, 2008-02-28.

[15]Stanford Facts 2010[EB/OL]. http://www.stanford.edu/about/facts/pdf/StanfordFacts_2010.pdf, 2010-06-05.

[18]汪霞, 李联明. 美国大学与企业研发合作的方法、拨款与运作机制[J]. 全球教育展望, 2008, (5): 58.

[19]谷贤林. 美国研究型大学管理——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力的平衡与制约[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88-92.

[20][21][美]托马斯·弗里德曼. 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 [M]. 何帆, 等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271, 289.

[22]姜文闵. 世界著名学府: 哈佛大学[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6. 4.

[23][24][美]詹姆斯·杜德斯达. 21世纪的大学[M]. 刘彤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99, 72.

The Strategy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Construction Model in America

GENG Youquan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model means a kind of practicing paradigm that a country builds world-class university effectively from the 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 The ke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find world-class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model fit for the United States, whose contents include: building a free, open, expensiv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o support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with diversify investment policy, to make the world's elite into circulation system of American University, to gather global elite with the academic center and top items, to forge a consensus on security crisis and hardship of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to lead university philosophy spiritual realm with the top Ivy League. In the 21st centur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goal of constructing world-class university in China as quickly as possible, we must buil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orld-class"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mode based on our national situation and institution in China.

Key words: world-class university; the U.S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model; the U.S. strategy

[责任编辑: 刘 怡]